

#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  
朱海滨  
著

33

復旦大學出版社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为复旦大学创新基地二期项目“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

（项目批准号：05FCZD005）和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宗教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的成果

#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

——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  
朱海滨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  
朱海滨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7-309-06083-6

I. 祭… II. 朱… III. 信仰—民间文化—研究—浙江省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5135 号

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  
朱海滨 著

---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

责任编辑 陈 军

出 品 人 贺圣遂

---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309-06083-6 / B·292  
定 价 22.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内容简介

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为了能更有效地支配全国各地，中央王朝通过制定祭祀政策对各地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加强了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的渗透。那么，在中央祭祀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到底又是如何去“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的呢？民间信仰领域又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洗牌、重组活动”呢？而这其中的主角，即到底是怎样的社会集团在参与、主导其变化呢？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此尚无专门研究。本书将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地区，利用碑刻资料、地方志中的祠庙志、文集笔记以及民俗学的调查资料，选择有代表性的民间信仰现象作为案例，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具体的探讨。

# 序 一

构成现代中国历史学界核心、并牵引着学界发展的是所谓的 77 级、78 级学生及大致相同时期进入研究生院学习的人。这些贤士开始学习之时,在下已经步入了不惑之年。作为一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徒,对于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状况,我深感不满,只要有机会,我便在中国提起如下的问题:为什么不研究汉族的农村聚落地理?必须要考察汉族农民的社会共同性。与所谓的“无神论”等没有关系,汉族老百姓的共同信仰及祭祀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考察课题等等。

农村聚落、共同性(也可以说成是共同体)、共同祭祀等事项原本应该由本国的学者才能积贮起丰富的考察,像在下这样的外国学者,自然希望在他们的成果基础上进行立论。但是,这样的理想状态并没有成为现实,尤其是进入 90 年代之前有关汉人的信仰、农村聚落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即便是 21 世纪的今天,对于乡村聚落地理方面,在很多地区还基本上呈现空白状态。

最近 15 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郑振满、陈支平、刘志伟、陈春声、赵世瑜等我年轻时已认识的畏友们,还有现在尚未谋面的朱小田教授等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一辈加入了这一领域,结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作为一位已迎来古稀之年的外国老学者,想到三四十年的研究状态,情不自禁地有抚今思昔之叹。

本书作者朱海滨君是一位出身浙东山区农村的,纯粹的农家子弟。他在那里走出,进入中山大学学习人类学,研究生则是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的门下研究浙江文化地理,取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周教授及当时所长葛剑雄教授的推荐之下

来到日本,进入在在在职的大阪大学大学院博士班学习。由于是自费留学,加上年龄的关系,所获奖学金也谈不上充裕,其研究生活是非常严峻的。尽管如此,朱君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胆怯,掌握了完美的日语,非常踏实、贪欲般地吸收日本的研究方法。其研究、学习之态度,虽然有时固执地坚持己见,但这同时也是一个知识人的优点。对于指导教师来说,就像是日本俗称的“有锻造价值”的学生。苦学5年,在《东方学》、《东洋学报》这样代表日本东洋学水准的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清除了审查博士论文所附加的、在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两篇论文的障碍,以故乡浙江地区老百姓的共同信仰为主题,向大阪大学提交了学位论文,获得了大阪大学博士(文学)学位。也就是说作者拥有中国及日本的两个博士学位。

现在复旦大学出版社要出版其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学术成果。作为主题的汉族民间信仰,反映了广大中国各地的自然、经济、文化,有时是政治状况,绝不是清一色的,而是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都必须立足于掌握各个地域的历史、社会特性的基础上,具体地探讨各地神灵的由来、特征、变迁。就中国全体来看,我不得不说还有大量的空白,朱君的力作,将填补这样的空白。与此同时,汉人的神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如何产生的?怎样发展、扩大的(也包括经常出现的衰落)?对于解明汉族宗教、信仰普遍性的逻辑,做出了贡献。

于私而言,作为其导师的在下的喜悦之情是非常大的。更进一步,于公而言,朱君接在前面列举的中国先达们后面,加入了民间信仰历史研究的阵列,将会使那越来越厚重的、不断积累的知见更为丰富,我从心底表示祝贺。我坚信,今后作者通过这一领域的研究,将不断成长为放眼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人,就此搁笔。

大阪大学大学院荣誉教授 滨岛敦俊  
2007年9月22日(古稀之日)

## 序 二

在我国,民间信仰的性质介乎宗教与风俗之间。当某种民间信仰还只是具有纯粹的民间——或曰庶民——性质,而且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流行时,与风俗的其他形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完全可视为风俗的一部分。中国的地方志里风俗部分经常提到各种民间信仰,至今各地所编纂的风俗志里也包含了民间信仰的内容都是有其道理的。但是当某种民间信仰具有全民的性质,而且信仰范围扩大到相当的地域范围时,就有可能向国家宗教转化。因此,在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学术界对民间信仰是否只是庶民的信仰,历来是有争议的,而在中国这一点其实没有什么可争。中国的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并没有绝对的鸿沟,前者完全可以向后者转化。

进一步而言,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的承认,得到承认的则成为正祀,列入国家祭典,如果得不到承认,那么就有可能成为淫祀而被毁弃。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信仰为了保证自己的长期存在,就必须考虑如何迎合适应官方的需要——这种需要往往与教化相关,即弱化荒诞不经的内涵,提高正统化的神性——往往还要符合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并且扩展信仰地域,影响多量信众,以争取编入国家宗教的行列。不过官方的需要也并非一成不变,尽管儒家思想占上风,但有时也会因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而有其他偏向,这时民间信仰也要随之沉浮,才有存在的可能。

二十多年前,我写作《秦汉宗教地理略说》<sup>①</sup>的时候,开始注意到先秦秦汉时期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问题。从《史记·封禅书》与《汉书》的《郊祀志》、《地理志》的记载可以看到这一转化过程的基本面貌,我在上述拙文中就初步分析了这样的过程。而类似的转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而已。我们在朱海滨这本《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里就可以看到,到了宋代,国家对民间信仰采取怎样的具体政策予以处理:一方面是用加封赐额的方式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宗教的范畴;另一方面则是将不合政治需要的民间信仰归入淫祠而严令毁弃。而到明清两代,儒家的祭祀原理一方面对国家的宗教政策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这种影响有时又有名无实,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信仰和国家宗教的关系出现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面貌。

海滨用以说明上述结论的实例全部来自浙江,虽然在地域上相对集中,却使之能有足够的研究深度,从而加强了分析论证的力度。如对关羽信仰的提升过程,论者皆不得其详,海滨运用他所掌握的资料,大胆断定北宋末年以前关羽神灵不过是一位影响较大的地方神而已,后来由于道教的推动,其信仰才开始在浙江等地出现。到了明代,才确立了全国神的地位。这一变化的背景就在于关羽信仰完全符合明代“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要求。入清后,满人政权为了从文化方面支配汉族,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祭祀政策。雍正年间进一步整备了全国统一的关羽祭祀制度,更使关羽神上升到与文圣孔子并列的武圣的高度。而对于地方祭祀主动适应国家宗教政策而提升地位的例子,海滨则以周雄信仰的变迁予以说明。详细揭露地方人士如何通过故事的编造,使一介普通的甚至有点狭邪的五通神从神改造为符合儒家价值观的神祇,从而挤入官方的祭典,成为国家宗教的

<sup>①</sup> 收在《中国文化》集刊,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后收入《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作为该书的第二编。



一部分。第三个例子是胡则,这是一个真实人物,但却被赋予许多并不真实的故事,而由僧侣的推波助澜成为官方所认可的神祇。海滨虽然用的是浙江的例子,但解决的却是全国性的问题,因为这些例子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海滨是学历史地理专业出身的,所以对地理因素于民间信仰的影响,自然萦绕在心,本书第四章论述的就是浙江地理环境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关系。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极其丰富,为民间信仰的层出不穷与不断更新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因而创造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形态。根据区位、地貌及开发过程,浙江省历来被分为杭嘉湖宁绍、金衢严与台温处三个区域,不同区域内部的民间信仰各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这种情况其实与民俗是相对应的,而与宗教的形态不同。世界性的宗教除了起源与地理环境存在一定关系外,其传播过程与表现形态与自然环境关系并不大。因此对民间信仰的理解与分析不能忽视地理背景。

从全书看来,海滨比较娴熟地使用了历史学、地理学与人类学的方法,同时又充分注意到政治因素在民间信仰变迁中所起的作用,这是对中国特色的重视。相对而言,许多研究者在讨论民间信仰时常常注重于社会经济因素,而忽视政治因素的分量,这是很遗憾的。在中国历史上所体现出来的政教关系,都是政在教之上,尽管有时宗教很兴盛,但都在朝廷的控制之下,一旦出现有危及国家社会安全的情况,就会立即采取安定措施,甚至不惜采用如三武灭佛一类的极端举措。国家不但于宗教如此,对民间信仰也要严加控制,以防对社会的安定产生负面影响。不合适的淫祠要毁弃,受到批准的信仰要接受政府的管理,以使政在教之上的传统不受影响。这一重要的特点,许多人没有注意到,以致出现一些错误的认识,以为宗教信仰可以脱离政治而自行其是,其实这是完全不合中国传统的。

民间信仰的研究看来似乎是小道,但其实是大事,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宗教意识不发达,始终没有产生一神教,唯一的全国性宗

教——道教,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产生的。但中国并非没有信仰,尤其是对形形色色鬼神的信仰以及祖先崇拜,实在是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中国因为儒家思想在长时期里占据了重要地位,因而表面上是重人伦而轻宗教,但实际上作为民间信仰的神鬼巫崇拜一刻也没有中断过。非佛非道的妈祖在海峡两岸甚至成为最重要的信仰对象,至今依然兴盛,供奉妈祖的天妃宫在旧时甚至作为各省福建会馆的代称,说明民间信仰在中国是宗教风俗之际的重要的研究对象,锲而不舍且暮以之,必定会有出色的收获。

朱海滨曾经从我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浙江文化地理研究,其中已包含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后来他又东渡日本,在著名学者滨岛敦俊先生的指导下专门对民间信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终于在这一领域又取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从而在这一基础上写出了这部有分量的著作。我于民间信仰极有兴趣,曾经奢望将历代所有被清理的淫祠进行一番钩稽,以理解民间信仰的基本内涵,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始终未能着手。我期望朱海滨能以此书为开端,将民间信仰的研究持续进行下去,对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信仰从基础上作一番清理,以从整体上发现民间信仰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并注意其时代的差异与地域上的差异,从纷纭多变的民间信仰中理出一定的变化规律来。是所至望。

周振鹤

2008年5月8日

## 序 三

1991年上半年,我收到当时尚不认识的朱海滨君的来信,询问报考我们研究所研究生的有关问题。从来信我得知,他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分配至浙江省建德县文化局工作。暑假期间,我正好去新安江旅游,顺便约他在旅馆见面。了解他的情况后,我极力劝他报考,并建议他以历史文化地理为研究方向。次年他如愿以偿,成为周振鹤教授指导的硕士生,以后连读博士,再赴日本大阪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在,海滨博士以大阪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专著《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已排成清样,即将付梓。翻阅一过,不禁感慨系之。

与我们这一代人相比,海滨这一代要幸运得多,而海滨在他们这一代中又是相当幸运的。当然,这是就他的志向与兴趣而言,如果用其他观念,例如地位与财富,就未必如此。

我一般不参加单位组织的旅游,那年正好去了新安江,才有与海滨见面的机会,这促使他下决心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研究生,并且以历史文化地理为研究方向。否则,他或许会在文化局工作下去,或许会成为一名成功的文化官员,历史地理学界却会缺少一位有前途的学者。

海滨有幸成为周振鹤教授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历史文化地理领域受到完整的学术训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加上他原有的人类学根基,和对故乡浙江的深入了解,形成了他在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方面的优势。

能得到一位这样的名师指导已属幸运,海滨却获得了另一次机

会。1997年秋至1998年春,我在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担任客座教授,与前辈大阪大学滨岛敦俊教授时有过从,介绍了海滨的情况,滨岛教授欣然同意接收他为博士研究生。次年,海滨在获得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自费东渡,顺利通过大阪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滨岛先生的学生。在滨岛先生和片山刚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通过刻苦努力,又获得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青年学子纷纷出国游学,但往来不及在国内学好中国的学问,所以虽然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却难以在中外学问间融会贯通。而在国内获得博士学位,或已在学术上取得成就后再出国深造,大多限于语言能力或访问期限,只能浅尝辄止,无法深入。像海滨这样能够得两国一流学者之真传,领悟同中有异的学问真谛,体会双方学风之精华,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先师季龙(谭其骧)先生一贯重视中西、中外学问的交流,但在完成燕京大学研究生学业后,历经抗战颠沛流离、内战期间的生计维艰和“文化大革命”的迫害摧残,难得有几年安定,直到晚年才有一次访问日本的机会。如果他地下有知,也会为再传弟子们的幸运而欣慰。

海滨的幸运还在于他有全力支持他的岳父母和妻子。他自己家境清寒,要不是得到岳父母的资助,研究生刚毕业就自费留学是根本办不到的。为了让他们夫妇安心求学,岳父母还挑起为他们抚育幼儿的重担。海滨的妻子郁平是真正的“陪读”,既陪又读,等到“夫妻双双把家还”时,原来只有大专程度的郁平也带回了教育学硕士学位。

至于幸运之神为什么频频降临于海滨,我想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我向滨岛先生推荐海滨时,他唯一担心的是海滨的语言能力。但得知海滨已获得国际日语水平考试一级证书时,就完全放心了。在完成繁重的博士课程和论文撰写同时,要将日语水平提高到对方教授认可的程度,显然不是凭了幸运。

海滨学成归国后,立即被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聘为副

教授。不过在去年卸任之前,作为所长的我也不无担心——与其他同仁相比,海滨发表的论文不多,在例行的考核检查中难显优势。最近我看到中国科技大学朱清时校长的一席话,才暗自惭愧。朱校长举了一个例子:两位才力相仿的中科大毕业生,留校的一位5年发表了几十篇论文,而到国外名校工作的一位每年只发表一篇论文。如果海滨也随大流,论文的数量或许能增加,却会失去他真正的优势。现在看他已经发表的论文,都相当扎实,达到较高的水平,自然胜过大量泛泛之作。

至于本书的重要性与取得的成就,滨岛先生和周振鹤教授的序言中已有介绍,同仁和读者也可自行评价,无需我赘言。

葛剑雄

2008年5月6日

## 内 容 提 要

拙著所说的“近世”是指宋元明清时期。宋代以来,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逐渐得到加强,与此同时中央王朝显然也已清晰地意识到了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控制对稳定各地社会秩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为了能更有效地支配全国各地,中央王朝通过制定政策对民间信仰现象进行干预、指导,加强了正统意识形态向民间社会的渗透。到了明初,中央王朝更是制定了原理主义色彩很浓的祭祀政策。此后数百年中,这一政策时松时紧,并出现过几次全国性的捣毁淫祠活动。那么,在中央祭祀政策实行“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分布于地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到底又是如何去“适应”王朝的祭祀政策呢?民间信仰领域又曾出现过什么样的“洗牌、重组活动”呢?而这其中的主角,也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集团在参与、主导其变化呢?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此尚无研究,本书将把地理范围锁定在浙江地区,利用碑刻资料、地方志中的祠庙志、文集笔记以及民俗学的调查资料,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绪论:笔者运用最近数十年来日本、欧美相关研究成果及自己所收集的资料(国内的研究几为空白),勾勒出近世中国中央祭祀政策演变的四个阶段:宋元时期的积极加封、赐额政策;明初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出现及其与现实的乖离;明中期儒教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复活;万历中期至清末为止原理主义的有名无实化。然后在此基础上提示“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课题的重要性。

第一章:该章考察了全国性神——关羽崇拜在浙江的出现及其普及。通过笔者的研究可知,北宋末之前关羽神不过是一位影响较

大的地方神而已,此后由于道教(天师教)的推动,其信仰才开始在浙江等地出现。到了明代,关羽神首次确立了全国神的地位,其背景就在于关羽信仰完全符合明中央“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要求及道教的推动。明代中期,原理主义政治势力大行其道,道士阶层充分利用该信仰符合明代儒教原理主义祭祀精神这一特点,与官僚、文人一道,大肆宣扬、推广其信仰,由此造成明代社会各阶层热衷于关羽信仰的局面。入清后,满人政权为了从文化方面支配汉族,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祭祀政策。雍正年间,中央王朝进一步整备了全国统一的关羽祭祀制度,期待关羽神(武圣)的“灵力”与孔子(文圣)之道一起发挥教化的职能。

第二章:该章考察了平民出身的地方神——周雄信仰在浙江地区的产生及其变迁。据笔者的考证可知,南宋时期五通神信仰在东南地区的扩展过程中,原本可能是巫师出身的临安府新城县人周雄(1188—1211),死后被当作五通神的从神而得到祭祀。此后通过创作大量灵异事迹及王朝对该神的加封、赐额,周雄神在东南地区迅速普及开来。尽管如此,由于周雄生前并没有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义行事迹,入明后没能被列入官方祀典。随着明中期打击淫祠活动的加强,作为普通地方神的周雄,其庙宇面临着被捣毁的危机。在此背景下,受苏州周容孝子信仰趋向繁盛的启发,也许是利用了元代新城县孝子周德骥的事迹,周雄生前是孝子的传说被编撰出来,由此迎合了儒家的忠孝理念,这样周雄信仰不但幸免于难,而且得到了地方官府的大力扶持,从而获得了新生,历经数世纪而不衰。

第三章:该章考察了生前属于士大夫阶层、出生于婺州永康县的胡则的生平和活动,以及其信仰在浙江的诞生及其扩大。胡则(963—1039)一方面是位有一定才干、政绩的官员,另一方面又被同僚指责为贪婪、结党营私的奸人。尽管如此,在其去世后,由于他生前曾奏免衢州、婺州身丁钱(先行研究多认为该事属于历史事实,笔者考证出这是传说,是胡则成神的契机)的传说被伪造出来,胡则信

仰便得以产生,此后随着其他灵异传说的不断涌现,其信仰终于在浙江地区不断扩大。在编撰传说、建造祠庙活动中,在利益驱动下的僧侣阶层自然而然地发挥了主导作用。与此同时,士人阶层(包含明初浙东儒臣在内)也不断美化胡则事迹,使之迎合了儒家的祭祀观念,并为其向中央王朝申请封号、庙额、编入祀典等,由此该信仰获得了官方这顶保护伞,终能长期繁荣于浙江中部地区。

第四章:通过第一、第二、第三章的具体案例研究得知民间信仰通过“适应”祭祀政策而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该章则从地域的角度分析民间信仰迎合祭祀政策的必然性。根据地理区位、地貌、水系及开发历史,浙江省可分为杭嘉湖宁绍、金衢严、台温处三个区域,这些区域内部的民间信仰各有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具体而言,明清时期杭嘉湖宁绍地区由于受蚕桑业、发达的水运及工商业、潮水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其地蚕神、航运保护神、财神、潮神等信仰普及;金、衢、严等浙江内陆地区则由于易遭受旱灾、乡土意识浓厚等因素的影响,胡则、徐偃王、周雄等乡土保护神较为发达;温、台、处等三府则由于历史上发达的巫术传统、福建移民较多、沿海平原开发易遭海水倒侵等情况的影响,其地马夫人、陈夫人、平水大王等女性神、开发保护神信仰昌盛。上述信仰现象都是当地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的反映,满足着各地民众的心理需求,因而地域社会的各阶层(特别是士人)才会向朝廷、地方官府等施加影响,使得这些信仰能长存不歇。

结论:通过上述各项案例、专题研究,在得出中央祭祀政策给各地民间信仰构图带来深刻影响(如明代关羽信仰的异军突起、周雄信仰通过追加孝子传说而获得了新的发展、胡则信仰通过士人阶层的美化而得到了正神的地位)这一结论的同时,指出民间信仰由于更深刻地受制于当地的特殊环境,使得原理主义祭祀政策的执行者不得不与地域社会中各阶层的代言人达成某种妥协,形成宋代以来中国特有的,表面上是儒家祭祀观念唱主角,实质上是各地传统信仰在延续的状况。宋代以来民间信仰领域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

总之,本书通过对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的探讨,揭示出中央祭祀政策的变化与民间信仰的连动关系,以及地域社会与民间信仰的对应法则,从不同的角度全方位揭示了近世中国民间信仰的发展态势。从民间信仰的层面,深层次窥视中国地域文化的形成轨迹及结构,必定会为重新认识近世中国文化的特征提供一些新的线索。